

文
艺
学
新
视
野
丛
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

杨春时 著

文学鼓
系术浪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

杨春时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年·哈尔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杨春时著.一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1

ISBN 7-5316-4068-6

I. 现… II. 杨… III. ①文学理论—研究—中国
②文艺美学—研究—中国 IV. 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199 号

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

XIANDAIXING SHIYIEZHONG DE WENXUE YU MEIXUE

杨春时 著

责任编辑:张希玉

封面设计:戚跃春

责任校对:秦 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9.375·字数 220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16-4068-6/B·68

定价:15.00 元

序 言

这本小册子主要记录了我在“超越实践美学”的讨论和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中的一些思考，也是近年来我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总结。

我发起并参加的第一场较大的学术论争是关于“超越实践美学”的讨论，从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美学思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属于新崛起的实践美学一派。但是，即使在那时候，我也对实践美学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疑虑，即实践是否可以成为美学的基本范畴？这种疑虑逐渐形成了一个问题意识。于是，我开始在思想上逐步地与实践美学告别。只是在当时与反映论美学的论战正酣，我不想挑起实践美学内部的分歧，因此没有进行公开的讨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反映论美学已经成为历史，而实践美学的局限也日益突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展开对实践美学的批评，以推进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1993 年底，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美学大会上，我作了“超越实践美学，建立现代美学”的发言。在当时，新崛起的实践美学已经战胜了反映论美学，无可争议地成为主流美学流派，甚至可以说取得了霸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实践美学的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后，我在《学术月刊》、《社

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展开了对实践美学的系统批判。这些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发了国内美学界的热烈讨论,产生了赞同的、反对的以及部分赞同、部分反对的各种意见。这场讨论规模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可以列为建国以来第三次美学大讨论。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美的主客观属性问题,形成了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 - 自然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 - 社会派、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和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第二次美学大讨论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美的本质问题,主要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和以蔡仪为代表的反映论美学的论战,论战的结果是确立实践美学的主导地位。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三次美学大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美学的哲学基础以及建立现代美学体系问题,论争的结果是打破了实践美学的一统天下,形成了“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的对峙。后实践美学借鉴了现代西方美学,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格局。尽管它并不成熟,但却表明中国美学已经走出前现代阶段,开始与现代世界美学接轨。在这次讨论的促进下,我也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

我还发起并参与了关于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从而开始了对文学现代性理论的研究。1996 年,我在写作《百年文心——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一书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一直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这种定性是否合理?这种想法也受到过黄保真教授等的启发,遂形成了一个问题意识。经过较为深入的思考,我执笔写作了《论中国文学的近代性》,此文经一位搞中国现代文学的青年学者作了史料上的补充,最后联名发表。由此又引发了关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的广泛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我发现表面上是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背后是一个文学现代性问题,因为文学现代性是确立现代中国文学史

的依据；而这个理论问题是在讨论前期没有提出来的。于是，我又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学史，发表了《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等一系列文章，并把这场讨论引到文学现代性问题上来。此前，现代性问题在国内外哲学、社会学界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在文学界还没有受到重视。我提出，文学现代性并不是社会现代性的移植，而是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超越，这是由文学的超越现实的本质决定的。用文学现代性理论来考察中国文学，就会确认，（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主流并没有获得现代性，因为它只肯定现代性，而没有反思、批判和超越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有待于挣脱理性主义的束缚，从而拥有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超越的维度。）关于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的结果是引入了文学现代性理论，从而提高了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水平，其意义不容低估。

现代性问题也涉及到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因此，我也进行了文学理论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对主体性理论的扬弃和对主体间性理论的接受。本来，实践美学的核心是主体性，其哲学基础就被李泽厚称为主体性实践哲学；关于美的本质也被确定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或“人化自然”。这说明要批判实践美学，必须批判主体性理论。（主体性是启蒙理性的核心，也是现代性的基础。欧洲近代和中国五四、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目标就是确立主体性，它适应了建设社会现代性的需要。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主体性论战中曾经是主体论阵营的骨干，主体性曾经是我的学术思想的核心。主体性思想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国内学术界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甚至形成了一种主体性崇拜。如果说主体性理论曾经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那么在后新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即不适应反思、批判

和超越社会现代性和确立审美现代性的需要,而且可能阻滞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发展,使其难以进入现代理论的核心领域。如果说主体性是实践美学和前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那么主体间性是后实践美学也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扬弃了主体性,确立了主体间性,不仅深化了对实践美学的批判,而且也找到了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支撑点。因此,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向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国内学术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创始人刘再复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国后,也曾经跟我提及引进主体间性、深化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设想,并约定我们共同进行这种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都还没有实践这种设想。2002年初,我在香港与刘再复先生进行了一场关于文学主体间性的对话,就这个问题达成了高度的共识。这个对话也作为附录收入这本小册子。

时光流逝,无所建树,令人怅惘不已。也许,我们没有固守在启蒙理性的阵地上,而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尽力走在学术思想的前沿,这是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

作 者

2002年1月于厦门大学白城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1)
一 “中国现代文学”质疑	(1)
二 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13)
三 走出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	(25)
第二章 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问题	(34)
一 美学要回应现代性的挑战	(34)
二 超越实践美学 建立现代美学	(39)
三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理论	(50)
第三章 现代性与通俗文学的兴起	(59)
一 审美现代性与大众审美文化	(59)
二 中国通俗文学的兴起	(69)
三 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	(81)
第四章 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94)
一 中华美学的古典主体间性与现代转型	(94)
二 从主体性文论到主体间性文论	(106)
三 实践美学的主体性与后实践美学的主体间性	(120)
第五章 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	(132)
一 多层面的文学本质观	(132)
二 文学作为异质文化	(151)
三 文学的意义和“意义剩余”	(158)

第六章 美学史的反思	(171)
一 五四文学：开放的启蒙主义	(171)
二 中国美学论争的历史经验	(187)
三 走出文学理论的困境	(204)
附论一：关于文学的主体间性的对话	(209)
附论二：关于文学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的论辩	(236)
一 乌托邦的建构与个体存在的迷失	
——李泽厚《第四提纲》质疑	(236)
二 再论超越实践美学	
——答朱立元同志	(245)
三 审美的超实践性与超理性	
——与刘纲纪先生商榷	(254)
四 对《“后实践美学”质疑》的质疑	(259)
五 “新实践美学”不能走出实践美学的困境	
——答易中天先生	(264)
六 “文学现代性”讨论的意义	
——对《现代性言说在中国》的质疑	(274)
七 文学性与现代性	
——《一个非文学性命题》引发的理论问题	(281)

第一章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一 “中国现代文学”质疑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被学术界称作中国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运动也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这就意味着在以往学者的眼中，从“五四”文学革命起始，中国文学就已经具有了现代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机械地套用西方文学史的分期于中国文学。20世纪的世界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属于现代文学范围，这种分期已经得到公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同样也属于现代文学范围，因为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的发展并不同步，它们之间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巨大的时差。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前现代的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前现代性或近代性，而不具有现代性。

确认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必须树立一个标准，这就是近代文学的概念。而要明确近代文学的概念，又必须首先明确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概念，因为近代文学是相对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而存在的，它是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形态和联接纽带。

什么是古代文学呢？这需要从古代社会形态谈起。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关系狭隘，专制统治严酷，个性未获解放。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文学受到意识形态的强力制约（如欧洲的宗教、中国的宗法礼教对于文学的干预与支配），因而形成了尊崇集体理性，严守形式规范的创作原则，体现了个性未获发展时代的审美理想。如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中世纪文学，以及19世纪中晚期以前的中国文学，均属于古代文学的范围。

什么是现代文学呢？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发达，社会关系建立在新型基础上，专制政治被民主政治所代替，人的个性得到解放，同时精神世界的困扰加剧。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文学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现代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更关注个体精神世界，突破理性与规范，带有鲜明的非理性倾向，文学表现形式也因此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总而言之，现代文学体现了个性解放的现代人的审美理想。欧美20世纪文学产生了诸多现代主义流派，而现代主义恰恰又是现代文学的代表性思潮。

近代文学同样要先从近代社会形态得到说明。在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这就是近代社会。近代社会产生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旧的社会关系随之瓦解，整个社会处于历史的变革与转型之中，欧洲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在西方历史上属于近代社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文学以肯定人的价值、关注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生存状况为己任，积极参与变革时代的社会实践，带有明显的实用功利主义性质。无可否认，近代文学作为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历史中介，的确存在着诸如群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理性与感性、意识形态化与文学独立存在等等复杂的矛盾与因素；而近代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如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

主义文学,都从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种过渡阶段的矛盾运动特征。西方近代文学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通过不断地自我否定,向现代文学形态过渡。

中国文学自先秦至 19 世纪中后期,都属于古代文学范围,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学思潮是古典主义,它尊崇儒家的道德理性,主张“文以载道”,强调“以理节情”,崇尚中和之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艺术规范(如格律诗、骈文等)。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以及理性主义的异常强固,中国古代文学缺乏向近代文学转化的内在动力,因而很难自然实现近代化。中国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化,不是它独立运动的结果,而是西方近代文学冲击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至 19 世纪末,中国文学也开始了它的近代变革。从此以后,中国开始接受欧洲的文学思想,欧洲的近代文学而不是传统的古典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和思想资源。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是与西方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学也从此摆脱了孤立封闭的状态,进入到世界文学的范围。这样,中国近代文学的确立,就必须放在世界文学的总体体系之中,遵循文学发展的共同原则,以世界文学史为参照系,采用世界文学的统一标准,而不能把自己孤立于世界文学系统之外,自行确立一套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勇气去面对一种严峻的现实:中国文学因与世界文学存有时差而处于滞后状态,20 世纪中国文学正在走欧洲近代文学已经走完了的道路,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它都是中国近代文学。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质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近代性质是基本一致的。19 世纪后半叶,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性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破后,就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面临着走

出传统、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具体地说就是消灭封建主义、实现工业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争取民族独立、创立民主政治制度等。这些艰巨的任务,西方发达国家在其近代史上早已完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上都在完成这个由近代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直到今天,这个任务尚未全部完成。这就是说,整个 20 世纪,中国社会实际上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而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则远未实现,若要真正进入到现代社会,这恐怕将是 21 世纪的事情。

20 世纪中国文学大体上与社会的发展保持着同步的关系,百年文学史就是近代文学史,对此人们无庸置疑。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是对国家、民族、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注,它以自己的方式作为近代意识形态的载体参与了社会的变革,这明显属于近代文学的主题,而不属于关注个体精神归宿的现代文学主题。20 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一方面反对传统的道德理性,同时又接受了人道主义和政治理性的支配;一方面突破了传统文学的陈腐规范(如五四时代废除文言文和旧体诗,对古典小说进行改造等),同时又接受了新的规范(如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近代文学过渡性特征的表现。20 世纪中国文学面临着三项艰巨的任务;第一,终结漫长的古典主义,建立起近代文学体系;第二,打破孤立封闭的状态,加入世界文学阵营;第三,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争取文学的独立存在。这三项任务,欧洲文学早在 19 世纪即大体完成。而在中国,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和反复,才基本上趋于完成。

中国的近代文学史,是由晚清起始的。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相继发生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这三大革命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刺激下,中国古典文学的自救运动。它的根本意图是想通过对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的

借鉴、吸收，在不根本改变中国传统文学体系的前提下，对其加以补充、修正和更新，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学传统。这种企图是与文化领域里“中体西用”思潮相一致的。但是，由于中国古典文学体系与西方近代文学体系的不相容性，第一次中西方文学思想的对话失败了。中国文学没能经过自我的合理调整而实现近代化，它不得不选择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五四时期的彻底反传统和全盘西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主义，实质上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作为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五四文学革命，也引进了欧洲近代文学思潮（主要是19世纪文学思潮），以实现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五四文学革命的表现特征，都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近代文学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首先，是人性的觉醒和人道主义的高扬。承认天赋人权，强调人的价值，主张发展健全的人格，用“人的文学”去反对“非人的文学”，把文学从封建宗法礼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正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主张。其次，是科学精神的高涨，五四文学家表现出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极大热情，并向神学偶像大胆挑战。科学的启蒙精神改变了人们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怀疑一切”、“求证一切”、“评判一切”口号的提出，触发了广大作家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形成了反对古典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主义思潮以及19世纪的现实主义是一致的。再者，是高举“社会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大旗，以人民大众为文学的接受对象，通过变革传统的文学创作的语言表现形式，向社会广泛传播人文主义思想。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平民主义文学思潮是一致的。最后，是反对古典主义，提倡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与欧洲19世纪文学思潮是一致的。文艺复兴是向宗教开战，中国没有宗教统治，只有礼教统

治,古典主义就是礼教统治的产物,因此,五四新文学向古典主义开战。陈独秀曾指出:“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① 这段话明白无误地揭示了五四文学革命反古典主义的性质。此外,五四时代那些极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他们所崇拜和模仿的精神偶像,几乎都是欧美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大师,五四文学思潮是欧洲19世纪文学思潮的回响,而不是其20世纪文学的回响,这就决定了新文学的近代性特征。所以,五四文学革命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开端,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近代性不仅表现在它反对古典主义,引进西方近代文学思潮,而且还表现在它排斥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时期,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已经确立,产生了诸如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流派。但是,现代主义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不大,几乎未能进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广大作家的视野之内。这绝不是一种人为的忽视,而是时代的选择。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在其发表的宣言中就公开声称:“写实主义文学,最近已见衰歇之象,就世界之立点而言,似乎已经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② 这说明五四文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中外文学之间的时差,并且在补现实主义课的基础上为下一步向现代文学阶段过渡做好了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五四新文学运动只是在后期才出现了像李金发、洪深等极少数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主流仍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进一步证明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场近代文学

^① 《答张永言》,《新青年》第1卷第4号,1915年1月15日。

^②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运动,而不是现代文学运动。胡适曾非常恰当地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运动正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的社会革命的兴起,“革命文学”运动发生,五四文学革命终止。从此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五四时代的“西化”演变成为“苏化”,苏联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取代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被接受,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经过“左联”时期、抗战文学时期、解放战争文学时期和20世纪50—60年代直至“文革”时期,这种趋势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对于这一段文学如何评价?它是否仍然属于近代文学的范围?按照传统的文学史观点,认为“革命文学”继承、发展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实质,并且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属于现代文学的范围。这里需要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革命文学”是否继承和发展了五四传统的问题,另一个是现代文学史分期与现代革命史的关系问题。关于后一个问题,应该区分开政治视角与文学视角。从政治视角把“革命文学”划入现代史范围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文学史的分期主要应该从文学的视角加以确定;况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在西方的历史上是近代革命的任务。关于前一个问题,也需要进行具体分析。“革命文学”引进苏俄文学思想,其目的是要对五四引进的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进行批判和否定,它以阶级意识批判人道主义,以政治功利主义批判“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的独立性,以“革命现实主义”批判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用集体理性取代个性主义精神。可以说,“革命文学”中断了五四文学传统,最终导致中国文学走上苏化道路。

那么,苏联文学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我们认为,它同样属于近代文学的范围。十月革命爆发前的俄国,封建主义势力十分

强大,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联,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它的性质当然属于前现代社会。同样,它的文学也只能具有近代性质。尽管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文学已出现了一些现代主义流派,但最终均遭扼杀,未能得到延续、发展。同时,曾经辉煌于世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日渐衰落、退化,最后形成了新古典主义文学形态。20世纪30年代苏联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突出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质和理想主义信念,以区别于19世纪现实主义的客观性和批判性。因此,它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客观性和批判性,堕入以理性矫饰现实的新古典主义窠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立了“反映现实的本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艺术规范,从而也带有新古典主义的规范化特征。追根溯源,苏联文学思想主要是源于“别、车、杜”的理论体系,而他们都是19世纪的俄国文艺理论家。尽管苏联文学把他们的“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形象思维”等思想与反映论相结合,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文艺思想的近代性质。苏联文学固守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加以强烈排斥,表明其前现代性质。苏联文学思想对中国左翼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其思想来源,因此二者都具有近代性。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开始全面接受苏联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到了40年代尤其是建国以后,又有所发展,并且中国化了,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如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同时还表现为文学理想主义的突出,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确立了“以写光明的、正面的事物为主”、“反映生活的本质”、“典型性就是阶级性”等文学规范,这恰恰表明了这个时期文学更为彻底的新古典主义化。新古典主义源自17世纪的欧洲文学思潮,它继承和改造了